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名家审订·字斟句酌·译文正确·注释扼要

白话十二经

上册
(附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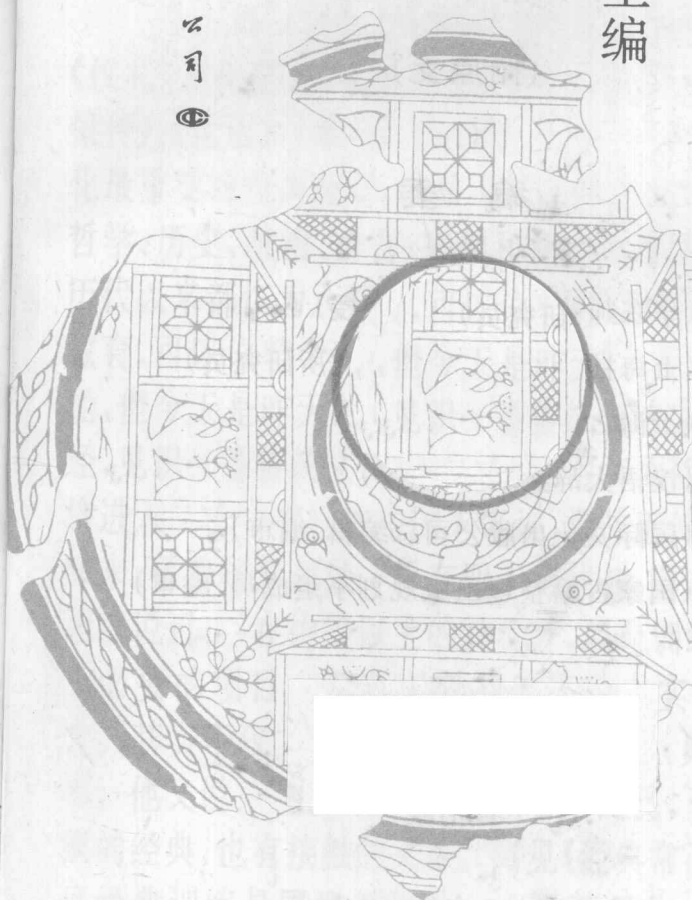
钱伯城·主编

白话十三经

(附原文)
上册

钱伯城·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白话十三经

(附原文)

上 中 下 三册

主编 钱伯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太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7.125 字数: 3,800,000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105-256-0/G·116 定价: 220.00 元

白话十三经

(附原文)

编 委

徐中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汤志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魏同贤(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傅元恺(汉语大辞典编委、编审)

孙以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编审)

钱伯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编审)

主 编

钱伯城

译注者

谷 玉 承 载 高 峯

金良年 钱 杭 谢柏梁

编者致辞

“十三经”(包含《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是我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也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哲学、历史、政治、语言、文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典籍,历代以来都作为人们自少至老必读的教科书。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就是读经的教育。今天虽不提倡读经,但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现在是过去的发展,读一点经,见识一番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内容和面貌,对每个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还有很多用处。早在四十年代初,著名学者朱自清就说过:“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其实不仅文化,也有实用,许多成语、典故出在里面。他又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见《经典常谈·序》)可见经典训练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容忽视。所谓经典训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提高文化素养,二是增强爱国思想。而进行经典训练,首要在于阅读原

书。

但是我国的经典，特别是“十三经”，文辞深奥，言简意赅，读起来十分困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从前人就有“皓首穷经”的说法（意思说钻研经书要花一辈子时间），读懂读通很不容易。汉代及其以后的许多学者（特别是唐、宋、清代的学者）在“读懂”“读通”经书方面做了大量的校勘和训诂工作，贡献很大，对读者很有帮助。但是他们的注释还是用的文言，对今天的读者并不适用。今天读者所需要的是白话翻译和白话注释的读本。

这部《白话十三经(附原文)》就是为帮助中等以上读者而集翻译和注释于一书的通俗读本。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白话翻译，译文力求准确，流利通畅，避免错译、漏译或增意多译，基本要求做到信达雅，可离开原文独立成书。第二部分为原文加白话注释，原文分段、标点，注释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但可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字义、句法和典故等。全书采用简体字横排，但遇某字简繁体易于混淆意义的，则仍用繁体，以便阅读。

“十三经”的译注，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部新的“十三经”译注本，虽集众人之力，龟勉从事，但识力所限，仍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祈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地 方

2502—2503 新 年
2503—2504 全 年
2504—2505 部 分
2505—2506 五

总 目 录

上 册

周 易	1—166
尚 书	167—322
诗 经	323—568
周 礼	569—776
仪 礼	777—982
礼 记	983—1326

中 册

春秋左传	1327—2034
春秋公羊传	2035—2258
春秋谷梁传	2259—2528

下 册

论 语	2529—2672
孝 经	2673—2702
尔 雅	2703—2948
孟 子	2949—3098

总 目 录

册 上

1—100	夏 商
101—200	周 代
201—300	秦 汉
301—400	魏 晋
401—500	宋 元
501—600	明 清
601—700	近 代
701—800	现 代
801—900	未 定
901—1000	未 定

册 中

1001—1100	春秋左传
1101—1200	春秋公羊传
1201—1300	春秋谷梁传

周易

承 载 译注

汤志钧 审阅

前 言

在《十三经》中,《周易》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特殊的著作。它的内容可分为符号和文字两个部分,符号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六十四卦”,文字部分则由“经”、“传”组成。“经”指记录占卜情况的卦辞和爻辞,“传”指解释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的文章,有《彖辞》上、下,《系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七种十篇,又称“十翼”。符号和卦辞、爻辞,是《周易》最基本的内容,“十翼”则是后人对卦爻辞所作的发挥和阐述,有些解释并不能准确地体现卦辞和爻辞的原意,而具有比较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

根据传统的说法,《周易》的作者与伏羲和周文王有关。《系辞》下篇提到,伏羲始作八卦,六十四卦的内容,又与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的事件有关。而《史记》更说“文王演《易》”,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这样一来,似乎《周易》的作者都是不同时代的“圣人”了。其实从书中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如《系辞》中说的伏羲取《离》卦而作网,但八卦的《离》中并无“网”的涵义,而六十四卦的《离》中才有这一意思。这样,难道连六十四卦的也是伏羲所作的了吗?再看六十四卦所记的事情,其中有“康侯用锡马蕃滋”的话,这是文王以后发生的事,它至少可以证明有的卦是在文王以后才产生的。《左传》、《国语》在记述春秋时人运用《周易》占筮的记载,共有十余条,其中《左传》即有十一条之多,可见《周易》在当时已经有人引以论事。另外,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周易》,为西汉文帝初年所抄,说明它的确没有在有“焚书坑儒”的灾难中遭到毁灭。从这些情况

来看,现在一般认为,《周易》的卦、爻辞,即“经”的部分,大约从西周中后期开始形成,其作者不是某一个人,到了春秋时期,《周易》基本上具备了今天所见的面目。

至于“十翼”的作者,也非孔子。例如,《彖辞》中有“汤武革命”的说法,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先见于《孟子》。《象辞》中的有些话,在《论语》中被移到了曾子的名下,如果《象辞》确为孔子所为,那么他的学生在编《论语》时怎么会如此大意呢?根据“十翼”的各篇内容分析,《系辞》《文言》约作于战国中期,《彖辞》和《象辞》,约作于战国的后期,《说卦》、《序卦》和《杂卦》,具体的创作年代不明,但在西汉初年已有运用的实例,那么,其创作也当不晚于这一时期。

《周易》之名的意义,历来有不同的几种解释。如解释“周”,有的说它具有“周密”、“周遍”、“周流”之意;也有认为《易》是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时根据八卦所作,当时周代尚未建立,文王以其所居之地的名称作题,后来周代建立,《易》就称之为《周易》,这样,“周”字就具有朝代名称的意义了。这两种说法,结合其它文献资料的考证研究,当以第二种说法较为有理。至于对“易”的解释就更多了。有的说是由蜥蜴的善变而取其名为“易”,有的说“易”是“日”“月”二字的组合,有的说“易”就是指变易的意思,还有的说“易”既有“变易”的意思,也有“简易”、“不易”的意思,更有人以为“易”字是“𪔐”(xí,檄)字的借用字,或说“易”就是当时占卜的名称。在《周礼》和《礼记》中,分别对当时主持占卜的情况有所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易”是一种主持占卜的官职的名称,而将这类官员取名为“易”,又是用其“变易”之意。在对《周易》的本来面目尚未完全弄清之前,也许这就算是一个比较稳妥而能得到公认的解释吧。

《周易》的“经”和“传”,到战国时期已基本完备了。在此后的流传过程当中,它主要是作为儒家学派的著作,但其他的思想学派也把它当作发挥本学派思想的依据,如道家、阴阳家、甚至后来的佛教也很重视它。这样,《周易》的流传就具有与其它儒家经典

不同的地方。据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就因为考虑到《易》是占卜之书,所以没有把它禁毁。这一事实,现已经被不少的出土文物所证明了。西汉初期,《易》的传播也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学者,阴阳家、黄老学派的学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就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诗》、《书》、《礼》、《易》、《春秋》“法定”为“五经”之后,其它学派的学者也仍有研习《易》的。不过,随着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深广,历代对《周易》的解说及其运用,毕竟也以儒家学派为最重要,而《周易》在儒家学派各部经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西汉时,《五经》的排列以作为德教的内容先后为次序,《周易》居《礼》之后,《春秋》之前,这是按照经书的难易程度来区分的。西汉以后,《周易》一下跃居《五经》之首,这是根据经书在封建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和写作年代的先后来区分的。此后《五经》又逐渐扩大为《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周易》列居首位的地位再也没有改变过。

《周易》六十四卦,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个经卦演化而成,分上下两部分。上经从《乾》到《离》,共三十个;下经从《咸》到《未济》,共三十四个。每卦由卦辞、爻辞两部分组成,加上解说卦、爻辞的《彖辞》、《象辞》,《乾》、《坤》二卦又有《文言》,假托孔子之名,对二卦的大义和卦、爻辞分别作出解说。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共计四百五十条,都是当时占筮吉凶的记录。根据其表现形式,大致上可以分成五种类型。(1)纯粹用来确定吉凶的文辞。如《乾》卦的“元亨,利贞”。(2)单纯叙事而不对吉凶作出判断的。如《坤》卦“初六”的“履霜,坚冰至”。(3)先叙事而后确定吉凶的。如《乾》卦“九三”中“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4)先定吉凶而后叙事的。如《小畜》的“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5)在一卦或一爻中兼及数事,以占筮的先后为序,叙事、定吉凶。如《复》卦的“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这些不同形式的卦爻辞,其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有战争、祭祀、生产、婚姻、行旅、打

猎等等当时人类社会的生活情况,也涉及到当时发生的气候变化、天象情况、自然灾害等等。如果撇开占筮的结果不谈,单是这些内容,就足以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了。要弄清占筮吉凶的文辞的实际意义,对后人来说是有困难的。有些文辞的意义比较明白,如各卦中出现较多的“利涉大川”,从中可见当时人对渡河的重视。但也有些文辞,由于缺乏对当时社会的详细了解,以及对占筮的具体背景不甚明了,所以颇费猜测。这也是后人在解释卦、爻辞时产生不同学派、不同方法之间的争论的原因之一。

六十四卦从八个经卦演化而成,那么,这八个经卦具有什么独立的和互相联系的意义呢?弄清楚这一点,对六十四卦之间的意义也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根据后人在《说卦》中的解释,八个经卦分别代表不同事物,其中比较主要的是,《乾》为天,《坤》为地,这两个卦又分别代表阳和阴,是八个经卦乃至六十四卦的统领之卦。其余六卦,用以象征天气节令,就是《震》为雷,初春,催动万物;《巽》为风,仲春,吹暖万物;《坎》为水,为雨,初夏,湿润万物;《离》为火,盛夏,干燥万物;《艮》为止,秋,万物停止生长;《兑》为喜悦,深秋,万物成熟。如果用以象征人类社会,《乾》、《坤》分别为父母,其余六卦中《震》、《坎》、《艮》分别为长男、中男、少男,《巽》、《离》、《兑》分别为长女、中女、少女。《说卦》中对八个经卦的意义还有别的解说,兹不赘举。从这些基本的意义中可以看出,八个经卦中各分阴阳,阴阳中各有先后、主从之分,反映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也正是在这些基本的意义中,体现了《周易》朴素的哲理。六十四卦由此而重叠复合,循环变化,始终没有脱离这一框架。

其实,就八个经卦的卦画而言,它们本不具备具体的象征意义。有一种说法认为,卦画中的“—”与“--”,都是古代生殖器崇拜风俗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并非没有根据,但用于解释卦画的本来意义,未必有力。有人曾根据至今尚存的四川凉山彝族所用的一种占筮方法,提出了卦画是以其画与数的排列而产生具

体意义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奇数和偶数的不同排列组合,构成了对占筮结果产生影响的意义。如三个奇数相连,要么大吉,要么大凶;三个偶数相连,无吉无凶;奇偶偶,大凶;偶奇奇,没有大的危险;奇偶奇,大吉;偶奇偶,没有大的危险;奇奇偶,吉利;偶偶奇,吉利。这种占筮结果的分派,显然是与数和画的排列次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将此与《周易》中八个经卦的形成及其占筮作用联系起来,至少可以说明这样的道理,即卦画只是古代占筮时所用的一种表数符号,它不是文字,也与当时流行的生殖器崇拜的习俗无关。至于是否与龟卜时的裂纹、征兆有关,当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对六十四卦的解说,自战国、秦、汉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方法和观点,随着后世对《周易》的内容和意义的重视,解说的方法不断增多,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但归结起来,最主要的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由象数入手认识,再是揭示其义理。以象数入手的解说方法,可从附在卦爻辞之后的《彖辞》、《象辞》中看出,揭示义理的方法,在《系辞》、《说卦》、《文言》中得到体现,前者重视形式,后者讲究内容。其实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一部《周易》,集中了先秦时期以儒家代表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富有哲理的认识,它至少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进步观念:(1)观物取象,(2)万物交感,(3)发展变化。《周易》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事物中,抽取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作为事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本原,构成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关系,如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有的相关,有的对立,有的在对立中又相关。这些基本的物质,又导致万物的生成,对形成整个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周易》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后世的学者,对发展《周易》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贡献。例如持“象数说”的一派,自西汉的孟喜而到京房(李君明)、焦贛,再到宋代的陈抟、邵雍,穷极造化,逐渐精深。持“义理说”的一派,自魏晋时的王弼,而到宋代的胡瑗、程颐、朱熹、李光、杨万里等人,或融入老、庄思想,或阐明儒家大义,

或兼证史实，以致一部《周易》，变得“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见，《周易》之所以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有如此之大的联系，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合理性、以及特殊的结构形式是分不开的。尽管后来的一些解说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它们也未尝不是依据《周易》而构筑的另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体系。对此，还是朱熹说得有理，他说：《易》真是难读啊，这大概是因为《易》本身就是占卜之书的缘故吧，但如今却要从中发挥出学问道德，所以这就成为另外一回事了。他又说：如今的人不知道过去的人作《易》的原因，却要解说它的道理，这样的话说得再好，也是与《易》的原意不相符合的。以此来看，要读懂《周易》，还是应当首先了解它的本来意义为好。

本书的白话翻译和简略的注释，大致上就按照这一原则进行。为了做到这点，基本上采取直译的方法，只是在文句的疏通方面稍作润色。对于其中所涉及的思想方面的情况，不作太多的说明，对于历代各家在意义理解方面的种种不同，也基本不加引述。有些文字的出入，均依通行本，确有必要纠正补充的，在注释中说明。由于《周易》的文字简略，不少占筮之辞的具体背景已不可能了解清楚，再加上历代注《易》、说《易》的著作如汗牛充栋，各家解说不一，在译注过程中也难免受其影响，因此，译注的难度较大，失当之处在所难免，这一点，还请读者不吝指正为幸。本书的初稿完成后，又经业师汤志钧先生审阅，谨此深致谢忱。

承 载

一九九四年四月

白 话 周 易